

元大都和杭州的国际性

鲍志成

摘要 本文指出元大都(北京)和杭州是元代中国北南两大都会,并从水陆海交通辐辏、亚欧非多族杂居、多民族文化交往等方面探讨了这两大都会所表现的国际性,从中可以看出元代社会是相当开放的,这有利于汉、蒙多民族文化的发展,有利于世界文明的发展。

关键词 元大都 杭州 国际性 比较研究

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的漠北各部族,建立了大蒙古国。继而西向征伐,灭畏兀儿、西辽、花剌子模、哈刺鲁、钦察、不里阿耳、斡罗斯、木剌夷、黑衣大食等国;南下中原汉地,灭夏、金;西南所至,征服吐蕃和大理。待忽必烈称帝,建元而灭宋以后,东起东海之滨,西至黑海南北和波斯湾地区,南抵喜马拉雅山脉,北达北冰洋的广大地域,统统纳入了蒙古统治者的势力范围。当时虽然有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等的分立,但与大蒙古国一脉相承,人主中原汉地的大元帝国,仍是各汗国的宗主国,元廷与各汗廷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宗藩关系。从中原汉地到各汗国的驿路交通,安全便捷,商旅使客,往来不绝。在蒙古西征南伐过程中,兵锋所及,几乎遍及整个亚洲,远及东欧,威震世界,各国或慑于武力或畏于亡国,纷纷遣使称藩纳贡,即使是罗马教皇也派使东来求和修好。在元代,传统的海陆交通所达范围更加扩大,加上元政府对外来文化、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从而使元代的東西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日益发达。凡此种种,都使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发展的极盛时期。

大都(今北京)和杭州,是元代中国北南方两大都会,它们不仅规模宏伟、人口众多、交通发达、经济繁荣,^[1]而且还是元一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是当时世界东方的两大国际性都市。本文拟从水陆海交通辐辏、亚欧非各族杂居、多民族文化交融等方面,就这两大都市的国际性作一探讨。不妥之处,请予匡正。

一、水陆海交通辐辏

安全便捷、范围广远的交通,是一个地方与外界发生联系的必要条件。在元代,无论是国内各地之间还是与国外的交通,都相当发达。元朝建立以前,蒙古本土以及从和林通往西北诸汗国、中原汉地的驿站,已经建立起来,东西陆路交通,为之畅通。元朝建立后,全国遍设驿站,数达1500多处,所至范围,东北到奴儿干之地(黑龙江入海口一带),北达吉利吉思部落(叶尼塞河上游地方),西南至于乌思藏宣慰司辖境(今西藏)。“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2],是当时国内外交通安全便捷的生动写照。遍布全国乃至通往国外的水路驿站和驿道,形成了一个系统的交通网络,而大都和杭州,则是这一网络中的两大枢纽。

元代的水路交通干线,是大都到杭州的大运河。元初,为了把江南的财赋运到大都,大规模修治运河,先后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从而使大运河南北贯通。其行程,北起大都积水潭漕运码头,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接白河,全长164里,是为通惠河。自通州经直沽(今天津南)接御河,是谓通州运粮河。由御河至山东临清,接会通河(从临清至东平,长250里)、济州河(东平至济宁,接泗水,入淮河)、扬州运河(淮河至扬州,入长江),至终点杭州,复与钱塘江相沟通。^[3]大运河不仅沟通了南北水路航线,而且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的航线,连接起来了。据记载,当时从大都到杭州的运河航程,约为两个月。^[4]沿途设有水站,配备站户、船只,负责供给官差使客食宿并用船只运送。元政府为了养护河道等,还多次下令在运河沿岸、大道旁边等地种植榆、槐、柳等树木。^[5]许多过往的外国使客、商人、旅行家,通过大运河北上南下。大

运河成了南北之间的一条安全便捷的交通干线。

陆路驿道,以大都为中心。从大都出发,有东、西、南三条干线,通向全国各地,有的则与西北诸汗国的驿道相连。东道由大都至通州,再到蓟州,然后分成几路,东连高丽,东北远至奴儿干。西道由大都到昌平,在榆林站分道,北向至上都,通往岭北行省的有帖里干道、木怜道、纳怜道等,和林至吉利吉思、外刺和察合台封地,均有草原驿路相通,并西向与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以及东欧各地相连,西向出关陇,由甘肃河西走廊,经丝绸之路新疆南北道,与中亚、西亚的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相通,远及地中海沿岸各国。南道经良乡、涿州南下,与华北、江南各地驿道相连。西南的藏、滇地区,则由西向的丝绸之路南折后通达,并与缅甸、安南相通。杭州位于东南一隅,在陆路交通中,并没有大都这样的全国中心地位,而仅仅是浙西地区的一个中转站。它的陆路驿道,主要是通往浙西地区的一条干道,从在城站经庙山站(今富阳庙山坞)到新城站(今富阳新登镇),然后西望临川站(今临安林川村),与其它相邻路、州的驿道相连。通过驿道,杭州还与钦察汗国的塔纳(今苏联罗斯托夫南)有商路相通。^[6]

恰恰相反,在海上交通方面,大都的地位又不如杭州。这也是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元代的海上交通,较之前代更加发达。从大都循运河到直沽,然后入海,绕山东半岛经成山角南下到长江口刘家港的海运航线,在元代也开通了直航航线,旬日可达。^[7]从东南沿海各港口(如泉州、宁波、温州、广州)出发,东到高丽、日本,南到南洋各国,西至印度洋沿岸各国,以及西亚、东非、北非海岸各地的航线,畅通无阻。而当时的杭州,则是这些航线上的一大港口。印度、埃及等地来杭的舶商,往来不绝,有的还定居于杭城。^[8]而元朝政府遣往南洋乃至东非国家的使臣,也常常从大都循陆路或水路驿站南下,经杭州、泉州等地出航。由于过往使客太多,需索浩繁,以致使站户的负担大大加重,无力为继。^[9]为了减轻压力,转运从泉州入口的大量番货,元政府还一度在杭州与泉州之间,设立过海站十五。^[10]

如此大范围、多渠道的交通网络,在强有力的统一国家的范围内,它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正是凭借这种安全便捷的交通,元帝国得以与东西方其它国家进行自由、频繁的交往接触。在古代中外关系的历史上,西行东来的中外旅行家,为数不少,而其中尤以元代居多。从耶律楚材、丘处机、常德的西游,到卢布鲁克、普兰诺·卡尔平尼、安德烈·海屯的东来;从列班扫马、汪大渊等的西行,到马可·波罗、鄂多立克、伊本·白图泰、马黎诺理等的东游;从赵良弼、宁一山等的东访日本,到邵元、雪村永梅等的来华求法,都可证明元代中外交通之发达,中外往来之频繁。在这些游历家的行程中,大都和杭州往往是必经之地。下面试举一二例以说明之。

马可·波罗一行来华走的是陆路。他们从地中海东岸的阿克拉(今海法北)东行,入伊利汗国境,经都城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士),至波斯湾港口忽里木子,然后越过巴达哈伤高原和帕米尔高原,进入元朝辖境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由南道继续东行,经斡端(今和田)、罗布泊等地,至沙州(今甘肃敦煌西);又经肃州(今酒泉)、甘州(今张掖)、凉州(今武威)、宁夏(今宁夏银川)、天德军(今内蒙呼和浩特东白塔)等地,于1275年到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欢迎。其后,他在中国侨居十七年,在大都、扬州等地做官,还奉差到过西南、东南以及东南亚各地。1290年下半年,他由大都出发,陪同阔真公主前往伊利汗国,乘驿南下,经杭州至泉州。1291年初,从泉州出发,由海道西归,于1293年夏抵达伊利汗国首都桃里寺,完成使命以后,他继续西行,回到故乡威尼斯。^[11]

元中期来华的意大利大旅行家鄂多立克,1318年开始东游,从君士坦丁堡到特列比松,再到巴格达,抵波斯湾,在忽里木子乘船赴印度西海岸的塔纳。由此到无离拔、梵答刺亦纳、僧急里、故临,再抵今斯里兰卡。从斯里兰卡乘船长途航行到苏门答腊,遍访南洋诸岛,经爪哇、加里曼丹、越南而抵中国的广州。由此东行至泉州、福州,北上经仙霞岭,至杭州,复至南京,再从扬州沿大运河北上到大都。留居三年后,又游历西南,行经天德、山西,到过西藏的拉萨,然后西折经中亚、波斯回到故乡意大利。^[12]

再如元后期来华的罗马教皇使臣马黎诺理一行,于1338年底奉命从阿维尼翁启程,东向先至钦察汗国都城萨莱(今苏联伏尔加格勒附近),然后继续沿商路东行到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于1342年7月抵上都,谒见元顺帝。使团一行32人,留居大都约三年,后坚请回国,获准乘驿南下,经杭州至泉州,由海道西还,于1353年返回出发地。^[13]

由上所述几位旅行家的行程路线,可知元代的国内、国外交通,通过水、陆、海交通线的相互连接,形成了一个范围广大的网络。而统一的国家和驿站制度的建立,又使这种交通既安全又便捷。作为一国之都的大都

和经济重心的杭州,恰恰是这一网络中的两大枢纽。

二、亚欧非各族杂居

国内外交通,尤其是东西方海陆交通的畅通,为中外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元一代,尤其是元初,大批的西域各族人纷纷东来,移居中原各地,而大都和杭州,则是两大聚居点,形成了亚欧非各族杂居的局面。

大都是一国之都,人口中有皇公贵戚、达官要人,也有禁军诸卫、工匠民户。而其民族成份,则更形纷杂。除了元朝本土的占人口主体的汉族、蒙古族以及契丹、女真等北方各族外,还居住了大量的西域各族移民。它们统称为色目人,包括西北各族,如唐兀、汪古等,以及西域乃至欧洲的畏兀儿、康里、钦察、阿速、斡罗斯、哈刺鲁、阿儿浑、回回等族人,其中以回回人居多。

最早来大都的名见于史籍的西域人是牙刺瓦赤,他是商人出身,原在中亚做官。1241年前来担任燕京行省长官。在任期间,大事搜括,“惟事货赂”。^[14]其后,定居大都的回回人逐渐增加。据载,壬子年(1252)原籍、中统四年(1263)续抄的大都路在城回回户达2953户,且“多系富商大贾兼并之家”^[15]。“在桑哥做宰相之时,一些木速蛮商人从忽里、不儿忽地区和乞儿吉思地区到了合罕的京城(即大都)”。有基督教徒爱薛怯里马赤、伊宾·马阿里和拜答黑,有毛拉不花刺人不儿哈纳丁传教于汗八里(即大都)^[16]。马可·波罗说,大都人户繁多,在十二大城门外的附廓区,“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又说,汗八里城诸基督教徒、回教徒及契丹人中,有星者、巫师约五千人,他们衣食仰于官赐,专执巫术,不为它业。^[17]鄂多立克也道,汗八里城中有基督徒、撒刺逊人(即回教徒)和各色偶像教徒,皇帝的医生中,也有这三类人。^[18]有个西域人,营于大都城外,自称驸马,冒名图利。^[19]可见,元代大都的普通居民中,有各个民族的各种职业的人,真可谓三教九流,四方各族,混居一城。

下层居民是这样,社会上层也是这样。在大都的中央行政机关里,有许多西域人执掌权柄,位重一时,有的甚至还左右了元代最高权力。如随成吉思汗东来的穆罕默德的圣裔赛典赤·赡思丁,初担任宿卫,后在蒙哥汗时担任燕京断事官,元世祖即位以后,任燕京宣抚使,吏户礼三部尚书,大司农卿,中书平章政事,后南赴抚滇,政绩卓著。其孙伯颜在世祖晚年至成宗时,任中书平章政事达十余年之久。^[20]回回人阿合马,在元世祖中统、至元初,任中书省平章政事十多年,专事搜括,贪赃不法,专权横暴,打击异己,使得元初政局一度受控于他。^[21]钦察人燕铁木儿及其子唐其势,在元武宗、文宗、明宗、宁宗、顺帝的皇位嬗变过程中,独掌军政大权,左右政局,位倾朝野。^[22]元代色目要官大多有开国的汗马功劳,在政治待遇上仅次于蒙古族,因此,在中央、地方的军政机构里,还有大批的色目人居位掌权,这些例子,不胜枚举。

此外,在庞大的禁卫诸军中,钦察、阿速、康里诸卫,环守大都;在专制宫廷用品的皇家手工业各局中,有大量的西域各族匠户。

总之,元代的大都,上下各阶层,左右各部门,都有西域各族移民,形成了一个杂居局面。

而作为江南政治、经济中心的杭州,也同样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明杭人田汝成云:“元时内附者,又往往编管江浙、闽广之间,而杭州尤多,号色目种。隆准深眸,不啖豕肉,婚姻丧葬,不与中国相通。”^[23]杭州色目人,主要也是回回人。陶宗仪说:“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24]这说明,当时杭州已形成了回回人聚居街坊。这还可从其它史料得到证实。伊本·白图泰说:杭州的第三城(厢)内,有穆斯林居住区。^[25]鄂多立克也说,杭州有四火撒刺逊,每火约十家或十二家组成。^[26]他们大多是商人,家饶于资,故称富实回回,且住高楼。当时杭州砂糖局的“糖官皆主鹁回回富商也”,他们用来煎熬砂糖的原料,是处州(今丽水)所产的狄蔗。他们熬制的砂糖,在果木铺高价出售,价格比之官方高出数十倍。^[27]主鹁,即术忽的异译,亦即犹太人,在元代被看作回回的一种。这则史料,说明回回商人垄断了杭州的制糖业,从中可见杭州工商界中回回商人的地位和作用。

回回人大多是伊斯兰教信徒,故此,他们居住的地方,必定有清真寺。据伊本·白图泰说,有一个埃及人欧斯曼,是杭州的一大巨商。他曾为其子孙修建了一座道堂,“建筑美丽,慈善基金很多,内有一批苏非修道者。欧斯曼还在该城修建了一座清真大寺,捐赠该寺和道堂大量慈善基金,该城的穆斯林很多”^[28]。此外,据田汝成记载,文锦坊南有元延祐间回回大师阿老瓦丁所建的清真寺,“寺基高五六尺,扁镬森固,罕得阑入者,俗称礼拜寺。”^[29]这所礼拜寺,就是现存的伊斯兰教四大名寺之一的凤凰寺。由于杭州有大批回回人居住,故不

仅有清真寺,而且还出现了公共墓地,聚景园即是其中之一。^[31]解放后人民政府于1955年4月至7月从这块占地84亩的回族公墓迁葬移埋了一万四千六百多具骸骨。

此外,其它西域人定居杭州的也不少。如南宋权臣贾似道的故居——养乐园,元时成了江州路同知西域人的居室。^[32]杭城之东有伟兀氏(即畏兀儿)居住,家饶金银珠玉帛。^[33]据《伊本·白图泰游记》的记载,当时杭州还有基督教人、犹太人以及崇拜太阳的土耳其人,并且人数很多。^[34]鄂多立克也说杭州有基督教徒。马可·波罗则感叹杭州人口众多,仅有景教(即基督教远东支派——聂斯脱里派)堂一所。^[35]据《至顺镇江志》卷九记载,杭州的这座景教堂,是中亚薛迷思干(今苏联撒马尔罕)的马薛里吉思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建立的,位于荐桥门,名为大普兴寺。另外,元代海上交通更为发达,东非、南亚、东南亚各国的船商来杭的也很多,有的定居杭城。马可·波罗就说杭州有许多印度等地的商人,以及他们贮藏货物的栈房。

综上所述,元大都和杭州,确已形成了中外各族相互杂居的局面。

三、多民族文化的交融

中外各族的相互杂居,为多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创造了客观条件。这种交流,内容是多方面的。这里从文化景观角度,着重谈谈大都和杭州两地汉族人民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西域各族移民的逐渐汉化两个方面。

在大都,几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呈现出中外文化交相辉映的文化景观。在政府机关里,蒙、汉、西域各族的官吏,在译史的帮助下,操着本族语言,相互商谈,办理公务。在驻守禁军中,不仅有来自中亚、东欧的钦察、康里、阿速、斡罗思等军人,而且还配备着回回炮等新式武器。在官营手工业各局里,许多西域能工巧匠在织造纳失失(是由别失八里田地,即今新疆吉木萨人工匠组成的别失八里局织造)、撒答刺欺等波斯、中亚风格的织物;^[36]原产波斯、阿剌伯的阿剌吉酒(即蒸馏酒)的酿制方法,传入大都,这种酒酒性甚烈,深得一些汉族士人的喜爱,宴饮之余,多有吟咏之作。^[37]在冶炼业方面,始产于中亚、波斯等地的镔铁(特种钢),在大都的镔铁局,已能打造多种器具,其中的回回刀,“价贵于金,实为犀利,王公贵人皆佩之”^[38]。在建筑方面,各族能工巧匠设计建造了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物,颇引人注目,如畏吾殿、棕毛殿和通用玻璃装饰的水晶圆殿等等,在建筑史上颇有重要意义。^[39]在大都城的建造过程中,阿拉伯建筑师也黑迭儿是主要的设计、建筑技术人员之一。^[40]在绘画方面,回回青、回回胭脂、西番碌等域外进口颜料,广为汉族画匠艺师们使用。^[41]在雕塑方面,尼泊尔雕塑家阿尼哥,技艺精湛,不仅创作了大都的许多皇家寺庙里的塑像,还培养出了刘元等杰出的汉人塑匠。^[42]在宫廷日常生活中,禁内御榻所用木材是从高丽运来的;^[43]所设浴室名为“温石浴堂”,很可能就是从北欧地方传入的桑那浴。^[44]在天文历算方面,大都官设的回回司天监中,阿拉伯、波斯的天文学家与汉族学者在聚议天文历算;^[45]他们所制订的《万年历》和许多天文观测仪器,被广为采用。^[46]在医学方面,宫廷的太医院下设有广惠司,专掌“回回药物”,有些珍贵的回回药物,成为御赐物品,回回药方至今仍有残本存世。^[47]在宗教方面,元政府采取了兼收并蓄的宽容政策,佛、道以及喇嘛、萨蛮等汉、藏、蒙等民族宗教,与外来的伊斯兰教、景教、天主教等,终元一代,长期共存。

由于长期受汉文化的熏陶,许多色目人逐渐汉化,其中许多人成了大都文艺舞台上出类拔萃的文学家、艺术家。如著名的山水画家高克恭是回回人,作家、诗人李齐贤是高丽人,诗人乃贤是哈刺鲁,文学家马祖常是汪古人,作曲家贯云石是畏兀儿人,诗人萨都刺是回回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杭州是文物之邦,号称“中夏声名文物之区”,故当时来杭的西域人也往往受汉文化的影响,取汉名,习汉字。如阿鲁浑人浦道吾(字善初),因宦于杭,迁居钱塘拱卫乡,有六子九孙,均取汉字,“三世衣被乎诗书,服行乎礼义”,是一个汉化了西域家族。其子溥博,字仲渊,娶萧山沙氏为妻,生有四子。这是中外异族之间通婚的一个典型例子。^[48]北庭畏兀儿文甫氏,“家于杭之清波门,自其祖参政忽撒公树槐三章于居之后苑,稍治园亭其中,名之曰槐圃,文甫氏弹琴读书,或与客觞咏,必于圃之所”^[49]。由此足见这位色目文人的风雅情趣和汉化之深了。有的色目人还精通汉文经典,考中了进士。如唐兀人迈里古思,字善卿,父别古思,因官而居于杭。他“自幼有奇气,善击搏技,既而自悔曰:伎勇有敌,圣旨之学无敌也。遂从师,通《诗》、《易》二经,以诗登进士第,官绍兴录事长”^[50]。回回人于闐慕离,家居杭州,登元统元年进士第。^[51]

杭州中外各族文化交流的另一个侧面,是民间文化的相互交流。当时杭州人所穿之靴,仿高丽式样,并成为一时所尚的流行款式。^[52]从东南亚进口的胡椒,成了居民日常所惯用的调味品,日进耗量达四十担之多。^[53]西域所产的西瓜等佳果美实,开始成了杭州社会上层人士相互馈赠的上等礼品。^[54]回回人阿里海牙之孙贯云

石, 隐居钱塘, 卖药市中。^[55]“白紵乌纱碧眼深”的西域相者王月屋, 携带布囊诗卷, 在杭城设摊看相, 聊以度日。^[56]

所有这些, 都汇织成一幅元代大都和杭州中外各族文化交相辉映的光怪陆离的人文景观。

四、余 论

从以上三方面的论述, 我们可知道, 元大都和杭州在对外交通上, 通过相互连接的水陆海要道, 可与亚洲各地、欧洲大陆和非洲东北部相通; 在人口的民族成份上, 不仅有元朝本土的蒙、汉等族人, 而且还有许多外来移民, 他们有的来自中亚、西亚和南亚各地, 也有的来自东欧和北非地区; 在中西文化交流上, 不仅汉文化与西北边疆各民族文化相交融, 而且汉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欧洲基督教文化也在这里相汇, 形成了世界东西方几大文明的大交汇局面。这在元以前的中国城市发展历史中, 是极为罕见的。

我们知道, 汉、唐长安(今西安), 其对外交通, 西向陆道虽有丝绸之路, 堪与元比, 但因地处内陆, 东阻于海, 其南海道, 与元不可同日而语; 北宋汴京以及辽、金、西夏诸都, 其情形更不待言; 南宋临安及东南沿海各城, 诸如广州、泉州、宁波等地, 虽东南皆通于海, 而西北均阻于陆, 故其交通都难以与元大都和杭州相提并论。而外来侨民, 东汉洛阳有身毒(印度)僧, 隋、唐长安, 有中亚诸胡、波斯、大食(阿拉伯帝国)人及东瀛日本人, 唐、宋时期扬、广、泉、杭诸州亦有东南亚、大食及日本人, 而元大都和杭州, 不唯有来自上述诸地之移民, 复有东欧、北非之侨民。至于中西文化之交流, 虽因时代之不同而有异, 然其在范围、规模、内容、结果诸方面, 也确相差甚远。就外来宗教之传播而言, 东汉洛阳有佛教之传入, 唐朝长安有景教徒之道途, 唐、宋东南各城有伊斯兰教以及摩尼教之流播, 而元大都和杭州等地, 不仅有伊斯兰教、景教、喇嘛教之传播, 复有或罗马天主教、或伊斯兰教苏非派之存在。凡此皆说明, 元大都和杭州的国际性, 是元以前的任何一个中国城市都难以与之相比拟的。

不仅如此, 即使在元以前的世界城市发展史上, 象元大都和杭州这样的国际性城市, 也是不多见的。由于地理因素的阻隔和交通工具的简陋, 长期以来东西方世界的相互了解, 是间接的、模糊不清的。在西方, 无论是罗马、君士坦丁堡, 还是巴黎、维也纳, 其对外交往的范围, 长期以欧洲为中心, 以中东为外围地区, 最远也不过到印度半岛西部, 而与东方中国的联系, 则是鞭长莫及。只有地处东西方两大文明间的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城市, 由于其地理位置的优越, 自古以来, 尤其是阿拉伯帝国兴起以后, 成了东西方文明的汇聚力, 并在那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伊斯兰文化。到了蒙古兴起, 西征东战, 不仅使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 而且把喜马拉雅山脉以北、黑海、里海以东的整个亚洲大陆, 统一在大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而这时的大马士革、巴格达等城, 已被战火严重地破坏, 东西方文明交汇的舞台, 移到了世界的东方。于是, 在金代中都基础上新建的元帝国都城大都和在南宋都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江南经济中心杭州, 成了东方文化迎接西方文化的两大窗口, 从而成了元以前的中国或世界城市发展历史上, 罕见的国际性都市。

从元大都和杭州的国际性, 我们可看出: 元代社会是相当开放的, 这是元政府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结果。而这种开放, 无论是对汉、蒙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还是对世界文明的进步, 都是大有益处的。

注释:

[1] 参阅陈高华著:《元大都》, 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拙作:《民物殷盛冠于江南——元代杭州的都市经济》, 杭州市政协编《名城杭州——元明清时期的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 王礼:《义冢记》,《麟原集》前集卷6。

[3]《元史》卷64、65《河渠志》; 苏天爵:《江浙行省浚治杭州河渠记》,《滋溪文稿》卷3。

[4]《埃及》教育部编, 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560页。

[5]《元典章》卷23《户部》9《栽种·道路栽植榆柳槐树》; 卷59《工部》2《道旁等处栽树》; (法)沙海昂注,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中册, 中华书局1954年版, 第405页。

[6] 参见《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21、19422, 中华书局影印; 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 帕哥罗提:《通商指南》, 转引自《元朝史》下册, 第391页。

[7] 章巽:《元“海运”航路考》,《地理学报》1957年1期;《元史》卷93《食货志·海运》。

[8] 参见《马可·波罗行纪》、《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关于杭州的部分。

[9]《元史》卷23《武宗本纪》“至大二年夏四月”条。

[10]参阅《经世大典序录·兵杂录·驿传》，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卷41；《元史》卷15《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二月”、卷16《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八年八月”条。

[11]参见余士雄：《中西方历史上的友好使者——马可·波罗》，收入作者自编《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12]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

[13]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2, London, 1866.

[14]《姚文献公》，《国朝名臣事略》卷8。

[15]王恽：《乌台笔补·为在都回回户不纳差税事状》，《秋涧文集》卷88。

[16]（波斯）拉施特丁著，余大钧译：《史集》卷2，商务印书馆，第346—347页。

[17]《马可·波罗行纪》中册，第379、413页。

[18]《鄂多立克东游录》，第75页。

[19]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国朝文录》卷65。

[20]《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

[21]《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22]《元史》卷138《燕铁木儿传》。

[23][29]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18。

[24][30]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8《嘲回回》。

[25][28][33]《伊本·白图泰游记》，第556—557页。

[26]《鄂多立克东游录》，第68页。

[27][31]杨瑞：《山居新语》。

[32]《南村辍耕录》卷11《女奴义烈》。

[34]《马可·波罗行纪》中册，第574页。

[35]《大元毡罽工物记》；《永乐大典》卷19781“局”门。

[36]黄玠：《升山小隐吟稿》卷2《阿刺吉》。

[37]叶子奇：《草木子》卷3《杂制篇》；《升山小隐吟稿》卷2。

[38]参见《元大都》第58页；《南村辍耕录》卷21《宫阙制度》。

[39]欧阳玄：《马合马沙碑》，《圭斋文集》卷9。

[40]《元代画塑记》。

[41]《元史》卷203《阿尼哥传》。

[42]《元史》卷90《百官志》。

[43]《元史》卷13《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二年秋七月”条。

[44]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366页。

[45]《元史》卷48《天文志》。

[46]宋大仁：《中国与阿拉伯的医药交流》，《历史研究》1959年第1期。

[47]宋濂：《西域蒲氏定姓碑文》，《宋文宪公全集》卷9。

[48]杨维禎：《槐圃记》，《东维子文集》卷17。

[49]《故忠勇西夏侯迈公墓铭》，《东维子文集》卷24。

[50]萧启庆：《元统元年进士隶校注》卷上。

[51]《南村辍耕录》卷28《处士门前怯薛》。

[52]《马可·波罗行纪》中册《补述行在》。

[53]大沂：《谢张雪峰司农惠西域诸果》，《蒲室集》卷5；吾丘衍：《西瓜诗》，《竹素山房集》卷2。

[54]《西湖游览志余》卷11。

[55]任士林：《赠相者王月屋》，《松乡集》卷9。